

中国的 改革哲学

李 拯 著

曹远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杨光斌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张 军

经济学家、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向松祚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王 庆

重阳投资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

联
袂
推
荐

用中国的方式讲好中国改革故事
建构中国气派的认知方法

中国改革用包容性思维
形成相互叠加的混合优势
成就中国经济奇迹

以5000年文明理解中国40年改革，
寻找引领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思维方式

中信出版集团



中国的 改革哲学

李 拯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的改革哲学 / 李拯著.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086-7639-5

I. ①中… II. ①李… III. ①改革开放—研究—中国
IV. ①D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9952 号

中国的改革哲学

著 者: 李 拯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1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7639-5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中国改革是自生长的“可持续生命过程”

2017年11月3日，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在封面上以简体中文和英文写上“中国赢了 China won”，这是全球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杂志首次在封面上同时出现两种文字。该期的封面报道认为：“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主导国际体系的美国模式更为完备，甚至更可持续。”

毫无疑问，这个封面立刻风靡全球，引起了世界对中国奇迹的新一轮关注与思考。到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周年。改革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力量，能在40年时间内让一个东方古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由此，如何理解中国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活力，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智力课题。

中国改革突破了既定认知模式

中国是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世界进入工业化的历史阶段，面对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构建经济激励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这一挑战，人类共创造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社会制度安排。迄今为止，尽管这两种体制模式针对的是同样的问题，但由于制度安排的原则和进入路线不同，体制运行的绩效也因此迥然有异。百余年的历史经验表明，计划经济对运行条件要求苛刻繁复，难以及时同时满足，运行效果不如运行条件相对简单明了的市场经济。这构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靠拢的内在倾向，并成为改革的动因。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中国改革开放为代表，形成全球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历史大潮。

按照人们积累的经济、社会知识既定模式，如果改革是体制转轨，自然既是历史的停止，也是新历史的开启。中断意味着跳跃，它是一次性跨越历史的壕沟。事实上，苏联解体后，那些东欧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转型是遵循这一逻辑，以休克疗法纵身一跃。且不论是否到达了彼岸，仅从过程来看，其代价是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表现为GDP（国内生产总值）一度大幅下滑，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质量急剧恶化。同理，按照人们积累的经济、社会知识既定模式，如果改革仅是对原有体制的改良，则意味着是对历史的延续，不仅难以脱胎换骨，而且由于原有体制的惯性，往往使改革陷入行政性放权的逻辑，呈现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无出路运动之中。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许多计划经济国家，尤其以原

属苏联的东欧国家为代表，屡次发动过改革，但屡次半途而废，并未明显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这不仅是这类情形的写照，而且也往往引申为“计划经济体制不可改，改不好”的理由。

自 1978 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则超越了人类积累的经济、社会知识既定模式。相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联采取的激进式改革，中国改革是渐进的，呈现出路径依赖式的连续性，并因连续性而使 GDP 呈现出不断增长过程，同时也使得经济、社会、政治秩序呈现出持续稳定有序状况。相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苏联采取的仅限于体制内的“改革的尝试”，中国改革又是“革命性”的，其目标模式具有明确的市场指向，具有了超越传统仅在体制内收放循环的能力。由于这一超越能力，使中国与既有计划经济体制渐行渐远，与市场经济渐行渐近。改革进程由此呈现为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过程。

这种极具特色的改革路线，不仅使改革具有了特定的形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使改革成为一个不间断的演化过程。每一步改革是有限的，但为下一步改革创造了条件，每一步改革是上一步改革的自然结果，又是下一步改革的过渡基础。由此，步步衔接，首尾相贯。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获得目标的同时获得动力，并由于改革有限目标的连续实现，体制因此在蜕变的过程中获得新生。它构成了中国改革成功的奥秘。

中国改革的哲学是让老百姓得实惠

理解中国改革奥秘的钥匙在于其改革的哲学以及由此产生的改革

推进方式。从经济学理论意义上讲，制度变革是有收益的，否则就不会变革，同时制度变革是有成本的，否则变革就会无关痛痒。换言之，由于变革成本巨大，不到变革收益能覆盖变革成本时，变革就不会成功，这让“变革是间断的”成为人们既定的认知模式和刻板印象。

然而，这仅是世界多样性中的一种模式。变革的成本是预付的，变革的收益是预期的，当收益不能时时处处覆盖成本，变革就会间断。反之，如果变革的收益能时时处处覆盖变革的成本，变革便可称为一个自维持的过程，如果变革的收益不仅能覆盖变革的成本，而且还有剩余的话，变革就会成为一个自生长的过程，成为多样世界的另一种模式。中国改革的哲学就是要让老百姓获得实惠，即在理论意义上，变革收益时时处处覆盖成本并有剩余。由于改革使老百姓获得实惠，改革就获得支持，由于实惠的逐步扩大，改革就会加速。改革由此具有了内生动力，并因此决定了改革推进方式不是外在推动，而是内在驱动，呈现为滚雪球式的自生长的演化过程，而有别于传统的间断性变革模式。

真理是简单的，其简单性就在于历史的进程与逻辑的进程是一致的。囿于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在 1978 年改革初始时，中国是一个具有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经济体，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市民等二元特征，被高度集中的计划包裹在一起。换言之，行政性的强制像一堆马铃薯被装进麻袋，而马铃薯之间甚少联系。其中最薄弱环节又在农村、农业和农民。按当时的语言表达，“小农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按现在的语言表达，个体农户具有穷则思变的动力。中国改革先在农村突破，承认农民的利益并允许农民去追求这一利益，激励着农民寻找最合适于自身发展的经济组织形式，具有中国

特色的以农户为基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运而生并蔚然成势，冲击并瓦解着原有的非自然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进而导致了基层行政体制的变革，使基层组织具有经济导向性。伴随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产品产出的上升，农民的货币收入随之快速增长。受工业化规律的支配，农民投资工业，形成中国式的农村工业化组织形式——乡镇企业。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强力冲击着以国营工业为基础的计划经济，诱导着国有企业行为方式的变化。国有企业不再是附属于政府的生产单位，而开始具有赢利动机。相应地，在新形势下巩固政府的公信力，地方政府的治理目标与方式也在悄悄地变化，经济绩效成为重要的考核目标。乡镇企业进城、对外开放扩大，各种经济成分加入中国工业化进程，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形成了极具目标竞争力的加工制造业，改变了城市原有单一的经济格局，尤其是当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以农民工的身份加入这一新型城市化的进程时，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而且是底层向上流动。由此出现的迁徙自由、择业自由，改变的不仅是经济结构，也是社会结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名词被创造出来：种田能手、万元户、农民工、乡镇企业家、星期日工程师、北漂一族、下海经商、停薪留职……这些新名词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对社会结构的引领作用，就像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所言：“中国经济改革的故事是坚强的民营企业家的故事，是勇敢的零星社会试验的故事，也是谦逊又刚毅的中国人民为了美好生活奋斗的故事。”

当改革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尝到甜头，有了获得感，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在发生着改变。向往改革成为集体意识，投身改革成为集体行

动，不墨守成规、勇于改革创新成为社会的风气，中华民族从未像今天这样自信、开朗，对未来充满信心。改革在改革本身中不断汲取了动力，改革具有了不可逆转之势。中国改革因此成为自生长过程，不断地在边际上引领整个体制的转轨，市场经济指向在滚雪球的改革过程中日益强化。改革由此逐渐从自发转变为自觉，成为一个自为的过程。它表明改革不仅可持续，而且更重要的是，改革本身就是一个自身可扩展的秩序安排。从这个意义讲，中国改革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有机生命过程。

改革通过汲取“负熵”走向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有序化

一旦以有机生命过程的角度观察，中国改革是可解释的。首先，是问题导向的。每一步改革的发动是为解决当前最为紧迫的经济、社会问题。换言之，危机导致了改革，改革是逼出来的。其次，解决问题的办法本身就蕴含在问题之中，它们一同产生，并一同消失。换言之，实事求是，以调查研究发现真问题就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再次，老问题的解决会在新层次上产生新问题，又会带来新的改革诉求，又需要解决新问题，依次循环上升不断地用改革解决问题。换言之，改革是一种梯次向前滚动推进的过程。最后，这一改革过程的实质是沿着帕累托最优改进方式进行的。在初始阶段，不改变既定利益格局的前提下，尽量扩大增量，在增量扩大的过程不断吸纳存量，最终实现“市场轨”取代“计划轨”。换言之，通过增量改革边际上引导存量的改革，使改革过程呈现为“一轨变两轨，两轨合一轨”的特点。由

上，双轨是理解中国改革过程的核心。

需要说明的是，双轨虽然是改革生长发生的土壤，但它也是一种混沌状态，而混沌意味着无序，意味着混乱。如何使其有序化，成为真正的发育，是以双轨制为基础的渐进式改革推进的关键。这不能不涉及政府其中的作用。理论上，改革不是不承认既定利益格局的“推倒重来式的革命”，也不是肯定既得利益格局的“温情脉脉的改良”。改革是在既定利益格局基础上又不承认既定利益永久性的变革，介乎于上述提到的“革命”与“改良”。其中，度的把握是至关重要的，而政府就是掌管这一阀门的操作员。它要求政府具有目光长远的前瞻性，又要有脚踏实地的操作性。

就中国改革经验而言，就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稳定是基础，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政府需要密切关注进展、顺应形势，应对、协调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原则是“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急功失大局”。中国把这种积 40 年改革之经验，称之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尽管当代中国政府的上述作为尚未有政治学学理意义上的满意解释，但日益引发各国的关注及反思，“世界向东看”成为新的全球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同，中国的成功使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更具多样性，“给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路径和可能性”。

在市场自发倾向的双轨、混沌中，政府诱导市场经济发育，市场与政府在包容与互补下相互试错，相互协调，改革不但在改革过程中获取目标，而且修正目标；目标与目标相衔接，在目标不断滚动过程中，无限逼近初衷。改革因此成为一种不断自我生长的可持续过程，

构成新的改革任务以及改革的契机，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展现出新的可能性空间。它构成了理解 40 年中国改革故事基本脉络的钥匙。

由上，中国改革的最大魅力，就在于改革的可持续性。它既不是机械相加的物理反应，也不只是产生新事物的化学反应，它是生物学反应的生命过程。改革是通过自我扬弃式的新陈代谢，不断汲取负熵，让多重元素并存的混沌状态不断地走向以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有序化，改革是通过体制创新不断克服无序化的熵，使整个体系充满活力，不断向上。在这一生命过程中，静态的目标模式已经不再重要，中国改革展现的正是不断应对挑战、解决问题从而适应外界变化的能力，这本身就意味着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用官方的话来说就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¹

“包容”支撑改革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为一个生命过程，其要义是包容，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展现出极大的包容性，把周边不同的民族都融入中国历史叙事中，并使中华文明延续 5 000 年，是世界上唯一未曾断代的文明体系。可见，包容性支撑了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是中华文明的生长方式。放在今天的语境中，改革的过程同样需要通过兼收并蓄的包容方式产生适应性变迁，解决不断涌现的新问题。这本书提炼出“包容”这个关键词，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改革开放联系起来，尝试着“以中国为方法”来

1 习近平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点，cpc.people.com.cn/xuexi/n/2015/0720/c397563-27331294.htm。

解释中国改革、讲好中国故事。事实上，当用“包容性”这个极具东方智慧的话语来解释中国改革，人们会看到，它是多维展开并相互融合的“非驴非马”的过程，是一个真实存在并继续生长的过程。

以经济学基础性的元概念产权为例。中国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既不是传统计划的“一大二公”，也不是典型西方市场经济的“纯私有”，农地的所有权依然是集体的，但使用权是农户的。这套独具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是中国农民创造的产权安排形式，不合乎既有市场经济理论的规范形式，但是有效的。不仅因为它的激励性扩大了当时的产出，而且因为它还可以演进、分解，衍生出使用权的流转、收益权的重新组合等新的演进形式，成为一个持续生长的过程。或许，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将这一过程提炼为“骡子”的概念，但包容却是跳出司空见惯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起点，因为它孕育了演化的种子，蕴含着演进的意义。对此，这本书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

自生长能力的表征是包容，包容的内涵是演进，它体现了生命过程的可持续发展性。可以说，是否具有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是衡量一个制度体系是否具有效率的根本标准，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否兴旺发达的根本标准。由此观之，在 40 年的时间节点上，中国的改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过去 40 年，获得了可持续发展能力；下一个阶段是未来如何维持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可持续性。经过 40 年发展，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正从自在阶段进入自觉阶段，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

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就要求我们的改革及时跟上人民诉求的变化，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社会、民生、文化等领域进行更加综合性的改革，用一种更加包容的方式顺应变化、维持可持续发展能力。

当前的中国正处于历史交汇期。投资拉动、资源环境、人口红利……40年来，这些驱动中国高速增长的动力正在减弱，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回望已往的改革，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培育和维持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性。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而中国已往40年的改革经验告诉我们，改革的方式、改革的进程，是无法坐在办公室里空想出来的，但一定可以在改革过程中找到答案。因为中国改革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建设现代化，就要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他们会寻找出合意的组织方式并推动其演进。正如这本书所言，40年兼收并蓄包容式的改革是一个生命过程，而生命过程具有无限生长的可能性。

曹远征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

坚持方向，混合至上

2018 年，即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中国时刻”，必然会诱发国内外思想者的想象力去探索这一历史事件的世界意义。这本书作者将其归结为包容型智慧，我高度认同，认为是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用我的说法就是“坚持方向，混合至上”。师生在同一个频道上思考问题，为师者倍感欣慰。

中国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方向是过去、现在的指南，同样应该是未来的方向。须知，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都走向了美国式的政治道路，它们能发展吗？民生状况又如何？看看我们的邻居——南亚、东南亚就知道了，更别说不安宁的很多非洲国家了。菲律宾是按照美国三权分立制度建立起来的，菲律宾还是它自己；印度是按照英国议会制建立起来的，印度也变不

成英国。反事实法告诉我们，中国如果不坚持自己的方向而改旗易帜，西方俱乐部只不过多了一位不能发展的大号成员而已，这个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加单调、没有竞争性、没有活力。问题是，西方俱乐部自身都遭遇大麻烦，宣称“美国第一”的特朗普几乎变成了孤立主义者，美国人所骄傲的软实力正在大打折扣。中国自身的成就、非西方国家的无效治理以及深陷麻烦之中的西方国家，都昭示了中国方向的正确性。

在坚持方向的前提下，天生具有实践理性的中国人推行了混合至上的大变革。一般说来，某种思想或政策只是体现了部分人的需求，因此极端化的思想和政策最终都会“独木难支”。1929年大萧条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失败，2008年的金融海啸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中国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教训，改革开放前纯粹的计划经济导致了经济困境。原因何在？其实道理很简单，在思想上，人群可分为左中右；在利益上，人群的层次性更多，任何纯而又纯的政策都不能满足所有人群的观念和利益需求。就是在这个常识意义上，政策必须是混合型的。其实，中外先贤都曾多次告诫我们这样的智慧，中国人讲究的是执两用中、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古希腊智者就认为最好政体是混合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混合型政体。

20世纪几乎是一个忘记常识的百年，包容性、混合性都被置于脑后。好在中国有了伟大的邓小平，他提出的“猫论”具有最典型的问题导向、实践理性，在此指导下的改革方案和公共政策也自然具有包容性、混合性。就经济学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典型的混合型体制和包容性理论。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竞争、少有创新、没有

富裕，但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不公正性所导致的社会分裂，这就需要以公正为基本价值的社会主义的方向和政策去引导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结合，体现着中国人善于驾驭矛盾复合体并进行优势互补的包容性能力。

包容性、混合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学理论上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 40 年改革是对既有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冲击，现在的社会科学理论应该对中国实践抱有敬畏意识，因为现在的理论尚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中国改革成就。比如说，如何计算政治发展能力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改革 40 年，中国执政党掌握政策方向的能力、进行中长期经济规划的能力，对于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又比如，如何衡量社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要知道，在世界经济史上，正是社会结构平等化的英国、美国率先引领了资本主义经济，而“二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能实现有效发展，正是因为深深地受制于其世袭制的土地制度。

政治发展能力、宏观社会结构，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这些“生产要素”并不属于资本、劳动或技术，而是为经济活动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架构，是经济活动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当我们审视中国改革 40 年的经济成就时，就不能忽视政治发展能力、宏观社会结构的推动作用，需要用一种综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学科的包容性视角。包容性的实践，需要包容性的审视，也需要包容性的思考、包容性的建构。

凡此种种，都是“中国时刻”带给世界思想界的挑战，也是一种弥足珍贵开放的思想空间，任凭各路思想豪杰去竞技。在世界历史

上，每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崛起，都会带来人类思想观念的更新，改变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中国时刻”带给世界的正是这样一个“思想的机会”。李拯的《中国的改革哲学》无疑提供了一个有竞争力的解释框架，一份献给“中国时刻”的思想大礼。

杨光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2018年2月3日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国际楼